

# 政府现在最好的救市就是观望

## ■今日视点

有关专家透露,发改委、统计局、央行、银监会、财政部等多部委日前专门在京召开房地产市场形势分析会,听取各地楼市运行情况的汇报,及专家和市场人士关于新的楼市调控政策的建议。中央地方正联动酝酿新一轮楼市振兴方案。上海正酝酿购房退税、办理蓝印户口等措施。

(1月21日《上海证券报》)从中央到地方2008年下半年推出了一箩筐救市政策,这些政策效果尚未充分显现,政府再酝酿救市政策必须谨慎,不可操之过急。政府出台利好政策如果不能做到动作一致、力度适中、节奏合理,不

仅难以达到救市的目的,甚至还可能起到反作用。

中央已经明确鼓励开发商降价促销,北京市长郭金龙承诺“政府不会为高价房托市”,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表态“房价不能高,不能再涨了”。这些信号明确告诉开发商不要死扛房价。但政府酝酿再救市的信号又给开发商幻想。显然,政府这种矛盾心态如果得不到改变,楼市很可能长时间陷入观望僵局——开发商等待政府救市,买房人等待开发商降价。

因此,政府对于楼市的态度应该明确再明确,不能一会儿促降价,一会儿又酝酿救市。即便有救市的必要,也应该是在摸底楼市、评估救市效

果的基础上有序出台政策,而不是把所有“炮弹”同时发射。如果“炮弹”用尽,就会陷入尴尬。

就拿上海正在酝酿的购房退税、办理蓝印户口等措施来说,笔者认为不宜仓促出台——购房退税往往让有钱人受惠,而蓝印户口则会扩大户籍等级。因此,有必要再三论证。

当前政府最好的救市手段就是观望,也就是说政府不要心急不要轻易伸手,让市场自行调节,让买房人和开发商自由博弈。让市场来决定房价该降还是该升。如果政府急于救市,就容易站在开发商一边,自然而然也就打破了买房人与开发商之间的平衡。

其实,政府理应认识到,楼市经过数年的牛市已经进入了调整周期,现在主要是市场在发挥作用,外力很难左右大局。只有意识到了这一点,政府才能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救市效果最理想。否则的话,费力不讨好,开发商会认为政府救市不积极,公众会认为政府偏心——政府救市的最后一剂药是“公信力”,而偏心就容易损失“公信力”。更重要的是,政府救市要有一个稳健的心态,要意识到楼市生病不是一天两天了,不可能下药即见效;应铭记“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观察救市效果需要时间。

(冯海宁)

# 企业社会责任就要这样走下纸面

## 【中国日记之童大煊专栏】

三一集团总经理向文波1月16日宣布,集团董事长梁稳根今年只领1元年薪,全体董事降薪90%,集团高管降薪50%,而对于普通员工,集团承诺“不裁员、不减薪、不接受员工降薪申请”,并拟出台“特别奖励”政策激励员工。

(1月19日《人民日报》)我们一直在提倡企业社会责任,但长期以来,纸上谈兵的多,真刀实枪操练的少。在金融危机下,很多企业不是裁员就是试图给员工减薪,我们更多的是隔着遥远的太平洋看着大洋彼岸的企业高管给自己降薪,但很少看到我们的企业高管拿自己“开刀”。三一重工让人眼睛一亮:原来我们的企业里也不乏“社会责任”这种高尚的道德因子。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财富分配状况是“财政富有,民间相对贫弱”、“企业管理层富有,而普通职员阶层

贫弱”。即使与邻邦印度相比,他们的薪酬占GDP的比重也比我们高,同时,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也比我们小得多。在我们的很多企业,高层与员工的薪水差距可能达到几百倍。甚至很多垄断国企的高管,也昂昂然凭着垄断地位拿与其贡献远远不相符的高薪。在此背景下,三一重工首先拿董事会成员和高管开刀,的确有着不一般的见识和胆略。

尽管一个好社会的标准多种多样,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标准和评价,但我以为,一个好社会的基本标准之一,便是有能力有实力的人,亦即社会上各个层面上的强者应该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危机来临时更是如此。比如经济不景气时,积极财政政策以及政府保障、投资支出增加而税收减少。在企业内部亦如是。如果一味把责任往下推,动辄对普通员工实施裁员或降薪措施,只会使占社会上绝大多

数的普通人购买力越发下降,从而使内需进一步收缩,反过来使更多的企业产品卖不出去,形成恶性循环。

道理很简单,谁都懂,但真正敢于拿出行动的,还是需要颇高的道德自觉和勇气,以及面对未来的长远目光。就像福特公司老板当年认为,应该让自己的员工都买得起自己生产的汽车,所以应该给员工高薪一样。一个对员工有凝聚力的企业,员工将会死心塌地地忠诚、效力于它。1914年1月5日,亨利·福特作出了一项举世瞩目的决定,将工人的日最低工资提高到5美元,远高于2美元的平均水准。后人评价说,这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也对美国乃至现代西方世界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它极大地增加了员工的归属感。在实施“新政”之前,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作队伍更率高达38%,而在5美元新政之后,劳动力的变更率降低了90%,旷工率更是从10%降到了0.3%。

更令福特惊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优秀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被吸收到厂,对福特公司的技术进步意义重大。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教授曾指出,日本公司采取终身雇佣,老板知道无法解雇工人,因而就围绕着工人一生的生产能力来对之进行培养。即使在经济不景气,工人手里没活干时,公司也不解雇员工,而是把闲着没事的工人组织起来培训:怎么更安全地操作生产工具,怎样提高产品质量等等。他们干这一切,都是拿着全薪。美国老板则一停产就解雇工人。结果,日本的劳工素质高于美国,其制造业也更有竞争力一些。

也许,在企业和社会发展的诸多秘密中,有制度的秘密、管理的秘密、资本的秘密,同样还有人力资本的秘密,但善待员工,进而形成坚韧的凝聚力,恐怕也是使自己未来立于不败之地的诀窍吧。(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 学会宽容“张扬的慈善”

## ■热点纵论

刚刚在央视年度经济人物评选中获得“年度经济人物大奖”的“中国首善”陈光标,又率领着63位企业家去四川灾区快报》报道说,这批红包总额由200元至2000元不等,第一批就将发出去两三百万元。

你不得不承认,陈光标是个很有表演天赋的人,就像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初他带领着浩浩荡荡的工程车队赶赴灾区一样,此次他组织企业家赶赴灾区发红包,同样是一场很吸引人的慈善大戏——做好事就要轰轰烈烈,就要做得家喻户晓,这或许就是陈光标张扬的个性带来的必然结果。

陈光标的表演天赋让他的善举动辄就成为舆论焦点,也时常把自己变成网民的“指责作秀”的靶子。当时他带工程机械千里迢迢赶赴灾区,就被很多网民认为是作秀,此次他率领企业家们去灾区发红包,同样引来了不少作秀的指责。搞慈善而被指作秀的,陈光标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张扬的慈善为什么总要和作秀这个字眼纠缠不清,这其实是一个微妙的社会心理问题。

长期以来,“做好事不留名”一直是我们最心仪的道德标杆,这其实意味着这样一种社会心理的认同:做好事者就不能期待任何回报,哪怕只是为了自己博点好名声,更不要说企业借慈善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了。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就是戴着这样一副眼镜去看各种慈善行为的,只要不符合“做好事不留

名”的最高道德标准,便统统斥责为作秀,仿佛慈善者后面总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只能说,这实在是一种不成熟的社会心态,这样的心态,对中国慈善事业的成长,不会有什么好处。没错,“做好事不留名”的确令人钦佩,但你得承认,这个道德标杆对一个普通的慈善者来说,实在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完美的道德标杆。这个社会上没有几个完人,更多的,只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对于普通人来说,你只能希望他多行善举,却不能要求他行善而不留名。我想说的是,只要一个人的善举能够增进社会的总福利,那他他就是应该受到尊敬的。至于他是不是能够从慈善行为中博得好的名声,是不是能够为自己的企业增加美誉度,那是另一回事。

以这样的标准来看张扬的陈光标,我怎么也不忍心去批评他的善举是别有用心——他拿出了那么多钱,他带动了那么多企业家,他给灾区的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即便是有作秀的成分,那又有什么不好的呢?你总不能说,李嘉诚以其名字来命名慈善基金、资助教育事业,也是为了出风头,也是别有用心慈善吧。如果“行善而不留名”是慈善的标杆,那么,慈善就将是这个社会的奢侈品。

慈善的成长,需要陈光标这样张扬的慈善者带动,需要制度的呵护,更需要宽容的社会心态,用平和务实的眼光去看陈光标们,你的心里会舒服许多,慈善的生长空间也会更大。(冬晖)

# 北川政府是否买过110万的车?

## ■公民发言

汶川地震八个多月后,北川再次成为网络焦点。事件起源于一个政府采购中标公告。

在一张名为“北川BCZC询(2009)02号采购工作用车中标公告(2009-1-12)”的政府网站截图上,清楚地显示着,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采购中心于2009年1月12日购买了两辆工作用车:一辆是依维柯运兵车,中标价为32.56万元;另一辆是丰田“兰德酷路泽”,中标价为110万元人民币。

作为刚遭过大灾、接受过全国各地捐助的县政府,在中央命令中不得超标购买公车并号召政府部门压缩开支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北川怎么会花110万买一辆公车呢?我随后登录绵阳政府采购网,打开“北川BCZC询(2009)02号采购工作用车中标公告(2009-1-12)”的页面时,却看

到里面只有一条记录:“依维柯运兵车:绵阳市鑫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一辆”。于是,疑问产生了:北川县政府究竟买没买过110万的丰田“兰德酷路泽”呢?

按常理,北川县政府不该买这辆车。110万的座驾无论对一个县,还是一个市,都已经严重超标。无论如何,北川采购110万公车一事已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成为影响政府形象的公共事件。这件事究竟是真是假,北川政府有责任澄清。按照《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办法》,在中标公告中,应该公告“中标供应商名称、地址和中标金额”。这么看来,在网上广为流传的“中标公告”似乎比绵阳政府采购网上的“现公告”更符合政府采购信息的发布规范。如果事实是北川县政府真的采购了一辆110万的公车,却因怕在网上遭到批评而删除了相关信息。那么,能够给我们真相的,就不再是北川政府了。(窦含章)

# 我们的钱包不能由权力控制

## 【学者视线之邵建专栏】

在最近的北京市政协会议上,一位委员建议:“发动一场爱国消费、扩内需、救中国的运动”,用爱心和民族精神鼓励进行消费。“具体做法是让每个人、每个单位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进行消费。如果政府允许这么说的话,我愿意拿出我的精力和我的财力去推动这个事情。”

政协委员在年度政协会议上的发言,照例都可以视为提案,是希望或建议政府如此去做。如果政府采纳了这条建议,那就很可怕了。消费是最典型、最普遍的日常生活,它时时处处发生。中国有一句老话,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无一不是消费。因此,当消费让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时候,这是正常状况。让我感到不正常的是,从“买房就是爱国”开始,到这里的“爱国消费”,消费居然和爱国挂

上了钩,还要以“运动”的方式进行,这显然背离了消费的本意(消费只能是为消费而消费,不必为任何其他)。但现在,按照这位委员的提议,原本正常的消费势必将被政治化和权力化。

以爱国为名头,以运动为方式,这样的运作大家都不陌生。计划经济时代,一切都在权力的计划中(其实是掌控)。以号召为先导,以运动为推动,当在计划体制的逻辑中。但今天,市场的艰难形成,正是要转换以往那个时代的“权力计划一切”。如果计划的主体是权力也只能是权力(权利只是被计划),那么,市场的逻辑则是把权利还原给无数的普通人,使他们成为市场的主体。市场的生性是自由,它没有运动之说,也不需要运动。因为运动具有裹挟性和胁迫性,它是和个人自由对立的。

这位委员试图以运动促消费,正是计划经济思维的延

伸,它把以前对于生产的计划延伸到了我们每个人的消费。如果让它来计划消费并能形成运动,其结果必然是严重侵害每个人的消费自由。

让人不解的是,这位委员不但把消费诉诸运动,更把它诉诸政府和权力。试问,消费和权力何干。政府的运作是公共领域,消费则属于私人领域。公私两界,权力的手再长,也不能伸入个人私域。所谓风能进雨能进,权力不能进,否则,这个社会势必导向权力的全能主义,这并非危言耸听。当该委员主张“让”每个人拿出一年的收入消费时,而且建议政府“允许”这么做,这简直是在呼吁政府就这么做。想一想吧,以政府的名义发起一场消费运动,并且让每个人都拿出一年的收入。虽谓之为“让”,但和强制还有什么区别。但我相信,政府理性上不会施行这样的运动,因为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让”人们一

定要消费的权力。在我看来,“发起消费运动”委实是一个品质不良的建议,既损民间,亦陷政府,是为两伤。

消费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事,它只服从消费者自己的意志,而不必也不能服从权力的意志。该委员的建议乃是把消费意志变成权力意志,让权力来控制我们的钱包。问题是,一个人的钱包被控制了,他的一切也随之被控制。这是一张多米诺骨牌,不得不多加小心。

从这位委员的提议,我不禁想到一个问题,在现有体制下,政协委员提案的出发点应该在哪里。我以为,任何一个提案,都应该从权利出发,让权力为权利做些什么;而不是从权力出发,建议权力让权利去做什么。这如果能成为一个基本立场,那么,可以看到,该委员的提案,不是为权利建言,而是在为权力谋利。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 熊振林展示了绝望者的可怕

## ■他山之石

央视《东方时空》面对面采访了熊振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着什么样的内心世界,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才连杀包括两岁半小孩在内的8人?熊振林对他的行为解释说:对生活感觉比较绝望,别的没什么。

在厌世者眼中,一切东西都失去价值、意义,包括自己的生命,当公众为那些无辜被害的人感到惋惜与痛苦时,他毫不介意,下手时也是毫不心软、犹豫。

从熊振林极端疯狂的行为范禽流感的关键时期,尤其是南方有宰杀活鸡活鸭过年的传统,需要特别防范和观察,如注意消毒和隔离。而且春节期间的食品烹制同样需要当心,没有经过深度加工的禽类制品也有潜在危险,一定要把食品煮熟烧透。所以,在欢度春节之时,不得不防禽流感。

(作者张田勤,原载1月21日《东方早报》,有删节)

必要再次重述这样一个道理:没有任何人能独善其身自我保障安全,每一个人的不幸都与你有关,每一个人的绝望都将减损你的幸福与安全。生活并不是你个人对生活充满希望就行,还得最大可能地让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拥有与你同样的希望,只要有一个人不幸,你的幸福就是没有保障的。

所以,不要仅仅只是关注你自己,还得关注别人。从更高的层面说,我们有责任努力让每一个人都最大可能地拥有希望与幸福,不至于陷入绝望与厌世。对生活困顿者,要帮助他们,给他们以最低生活保障;对艰于维生的小摊小贩,不要放任城管掀他们的摊;当不公平的事发生时,发出你的声音,进行谴责。

要知道,让人们陷入绝望,就是把他们交给了魔鬼,交给了暴力,每一个绝望者都可能成为熊振林。(作者范大中,原载1月21日《华商报》,有删节)

# 春节期间更要警惕禽流感

## ■他山之石

最近北京、山西、山东等省市连续发生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国家流感中心的专家表示,虽然我国连续出现几起病例,但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风险并没有增加。但是,农业部的专家却认为,由于春节将至,畜禽产品流动频繁、交易量大大,禽流感疫情发生和传播的风险增大。

一个说禽流感传播的风险没有增加,一个说风险增加了。听谁的为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所以,最好还是有点心理准备。

从流行病学的情况来看,中国既往发生禽流感的季节是在冬春季(11月至次年3月),70%以上的病例都是在这段时间发生的。因此,年末和初春是禽流感的易感时期,应引起更多重视。

另一方面,1月底是春节,禽流感传播的危险由此得到了扩散和增加。春节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家家户户都会阖家团聚,磨刀霍霍向“鸡羊”必不可少。在采买置办年货,烹调操办饮食时,人们接触家禽的机会比平时大大增多,从家禽那里染上禽流感的几率也必然增加。

防范冬春季禽流感对政府来说,是一项重要的任务。